

# 書評

## 1. 批評之外

### “老人”和“秋肅”

#### — 談兩個短篇

“老人”寫的是天安門事件之後，一個原屬台灣籍的老共產黨員，因參加這次事件而陷入另一個政治學習運動，隨着老人的回憶而牽起對黨對國家的種種興奮與不惑。“秋肅”則比較簡單，是一幕六八年文化大革命中發生在一所中學裏面的批評運動。主角是一位女教師，她的愛人（也是中學教員）被無故冠以反革命分子之後的失落與無措。

總之，兩篇小說都是寫國內兩番政治大風暴底下，一些無關重要的小人物和他們的周圍。明顯地，兩位作者都只是把一些平凡的而普遍真實的事件串連在一起，並沒有主觀的介入，替事件之外篆刻任何詮釋。這是寫作者應有的客觀態度。無論是那一個轟烈的運動，都會有它的擁護者和反對者。但在一些極權或是某一種政治氣候、社會意識統治下的國度裏，可能只有極少的反對者。而那許多默默無言的大多數，往往才是這大變動的真正受害者。對他們來說，國家上層的政治變動是高不可攀的，所以只求去適應這些變動。但當他們的生活甚至生命受到影響的時候，就會迫壓他們去面對、思考這些衆多的不可瞭解。所以，這些人面對的可能並不是政治運動本身的事實，反而是反映在個人身上的投射。這些投射，對整個運動來說，可能毫無意義，但卻決定了许多人的命運。若果歷史是人類生活的紀錄，那就應該包括這些人的徬徨與掙扎。但歷史始終有它客觀和本身的局限，因此就需要其他的見證——這就是文學創作者的責任。這裡，我們兩位很不同的作者，也分別承担着這一份責任。這是他們共通的地方。

至於他倆不同之處，我願以兩段故事的文字來開始。

“窗外幾時又刮起了風，一陣呼嘯而過，劃破夜的寂靜。……老人傾聽着，逐漸體會到一種時日無多的緊湊感覺。這種幽靜的

### 蕭偉業

夜，他想，不能用來製造無聊的政治廢話。這樣的夜最適合回憶，最宜於懷念遠方的親友，重溫童年的舊夢，最適合閉上眼睛，讓思想飛得遠遠的；飄過海洋，與家人重聚……”（老人）

“潔如走到窗前，看看窗外，月已偏西。四周都是黑沉沉的，一點亮光也沒有。大地死一般的寂靜。她記得曾經讀過一篇散文，說有一組晝與夜的交接點，……是最黑暗、最寧靜也是最寂寞的一刻。她相信她現在正處於這樣的交接點上。……也許還有更多的黑暗向她和他和他們的一家襲來。但是，……黑暗總要過去的，天總要亮的。”（秋肅）

老人因參加悼念周總理，上了幾次天安門廣場，也吟了幾首詩、讀了幾首詩。他不明白為什麼一夜之間花園都不見了，更不明白為什麼要寫自白書。二十多年來的政治起落他都木然地熬過了，但四月五日這番他卻動了真情，他見到陌生的羣衆感情，他想到周恩來對他的關懷，想到因投身革命而棄別台灣的妻兒家鄉，想到因生活需要而續娶的老妻的委曲。雖然他的一生曾經是革命的，進取的，但年紀和現實早令他退下來，蟄伏而投機地活下去。但現實卻不放過他，要他面對另一次翻天覆地的動亂。他終於肯定四月五日的一切，他沒有萎縮，不打算寫什麼獨白，也不期望什麼——故事就這樣完結。

一九七六年的四月，陳若曦早已結束了她的神話，並沒有親身經歷過天安門事件。她這篇作品，是基於過去經驗與觀察所得的合理推想而寫成的，雖非真實，但可以接納。故事裏面，並沒有指責任何人，更沒有預言什麼，也沒有向任何既定的事實挑戰。讀者面對的只是一個社會現實的片斷，除了同情之外，一種無可奈何之外，還有些什麼？

但邱國明的“秋肅”卻有明天。

小說的整個氣氛，可能只來自魯迅晚年的最後一首舊詩：

會驚秋肅臨天下 敢遣春遇上筆端  
塵海蒼茫沉百感 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歸大澤菰蒲盡 夢墜空雲齒髮寒  
竦聽荒雞編闕寂 起看星斗止闌干

據統墨炎的“魯迅舊詩淺說”指出，此詩約寫於一九三五年十月間，與當時階級與民族矛盾有密切的關係。三三年與三四年之間，是第五次圍剿與王明路線失敗之際；而三三年日軍攻入山海關、三五年五月更發生華北事件。這都是魯迅所謂的“秋肅臨天下”了，但前途是光明的。

邱國明在他的小說裏作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把六八年紅衛兵的革命鬥爭與一九四四年國民黨在廣州大迫害共黨人相提並論。好像說，六八年的日子與四四年是一樣的黑暗。但“黑暗總要過去的，天總要亮了”，四九年的中國不就是一片光明嗎？所以“起看星斗正闌干”的日子還遲早會來。

這就是“老人”跟“秋肅”不同的地方。邱國明肆意地指控現實，大胆地預言明天。小說裏，我們看到一幕鬥爭，與及一幕惶惑和迷惑，總算是時代的寫照。但也可以見到作者的急切介入，他匆忙地替一切現象安放明天。可以說，整篇作品是充滿預言性的，是擠斥着作者本身的取向的。若果從藝術技巧上來說，他是失敗的。因為他並未有讓讀者有足夠的投入去思想整個現實，去同情裏面的主角，去為她的遭遇尋求解釋和答案。

可能作者太過熱中於他的價值取向吧！

若果我們是肯定文學的意義，特別是作為一個瘡痍的時代的聲音的話，我們就應該要求作者更深切的投入，呈現更多的真象，絕不應該流於盲目的控訴與指標的堆砌。基於這些，所以我較為肯定陳若曦的老人。

但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除了關心自己同胞、自己國土、自己文化之外，也懂得多少把個人的將來結合起國家明天。所以一邊讀老人的時候，一面設想這位老人若在四人幫之後又是否會如何如何，總是下意識地懇請作者替他安排一個明天。所以一方面拒絕邱國明的時候，另一方面卻想着“星斗闌干”。

但無論如何，這兩篇小說也說明了一個事實——沉默了二十多年的中國大陸的確需要一些歷史的見證了！二十八年來，中國經歷過一個偉大的時代，所以我們迫切地需要文學作品，特別是像“老人”、“秋肅”這樣的作品，為這時代鑄下一頁頁的史詩。

## 2.「現代化」和「割離」的神話

### —申明—

如果你關心的是經濟落後國家的「現代化」問題，這部著作對你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假如你的興趣是「現代化」的一般理論，這本書對你亦是沒有多大幫助。就算以正統的發展社會學的標準來衡量，這亦是一部差勁得很的著作。況且新一代從事社會發展研究的西方學者，早已把陳舊的「現代化」理論拋諸腦後呢。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A·G·Frank, M·Godelier, E·Terray 或 Pierre-Philippe Rey 之後，有誰會對 Neil Smelser, Wilbert Moore, Marion Levy 或 S·N· Eisenstadt 感興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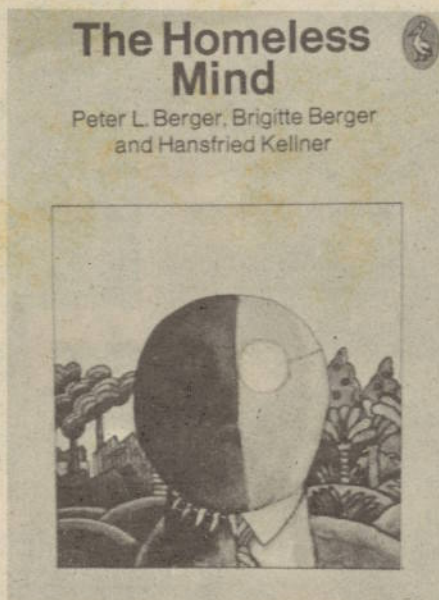
Homeless Mind 事實上不是一部關於「現代化」的著作，而是一部關於「現代意識」的書。我們怎能希望三個沉迷於 Alfred Schutz 的唯心主義現象學 (Phenomenology) 思想的社會學家理解「現代化」問題呢？(當然我們更不能奢望他們能批判「現代化」理論) 他們的理論架構 (Problematic) 裏祇能夠有什麼「主觀經驗」、「定義」等等東西，對他們來說，權力、勞動、階級、控制等，都不過是「象徵性」的東西吧。

當然，兩個貝加及卡拿要談「現代意識」就不可避免談談「現代化過程」。他們的「現代化」是取材於最正統的社會學的：現代化即科技發展所引發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制度。他們認為經濟發展必然導至科技生產、官僚組織、城市化、非宗教化和一些與這些發展相適應的意識。除非我們取消科技經濟發展，這些制度和意識層面產物是無可避免的。(或許讀者看到這裏會不禁大笑起來：這不是實証主義式 [Positivist] 的決定論嗎？現象學對實証主義的 Reification 批判到那裏去了？)

其實這部書主要分析的是現代化了的社會(即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裏年青一代的意識和反叛。作者們的理論是：(1)現代科技生產和官僚組織的高度理性和非人格化造成了嚴重的割離感；(2)城市化和大眾傳播的發展帶來生活多元化 (Pluralization of Social Life)，使很多價值的可信性大大減低，不穩定性 (Precariousness) 大大增加；(3)在傳統社會裏，宗教賦予一切事物以意義，「現代社會」沒有像宗教一樣的世界觀來統一萬物的意義；(4)個人主義使人們不再從社會制度和它們在制度內所扮演的角色找

尋價值和認同，他們追求的是「自我表達」、「個人成就」等等。換句話說，現代社會的問題是割離、失落和認同危機——到處流浪和沒有歸宿的精神。他們認為這是西方現代社會的反文化運動，希爾士運動、學運、婦解等等的原因——參加運動的人不外是追求精神上的歸宿。

解決方法？兩個貝加及卡拿的意見是：除非我們準備迎接經濟災禍，取消這些「現代制度」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現代社會」裏還有社會空間讓人們在科技生產官僚組織以外建立各類組織來解決精神的問題。(例子：任何形式的志願團體。這是他們提出來解決 Private 和 Public 之間的分裂的唯一方法。)



我想問題的中心是我們怎樣理「現代化」和「割離」這兩個概念和它們背後的理論。現代化理論把社會發展看待為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現代化」被理解為一個進化的過程 (evolutionist process)：從簡單的社會結構過渡到複雜的結構 (differentiation)。所謂「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其實都是唯心的抽象概念。應用史唯物主義研究原始社會的人類學家早已發現了「生產模式」階級矛盾和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 (Terray, Rey etc) 馬克思在百多年前已分析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

了。現代化理論把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看待為社會進化的必然產品，作用無非是替資本主義這歷史制度找尋「科學」的藉口吧。在這套理論裏，我們自然找不到什麼「階級關係」、「社會壓迫」等概念。我的意見是：忘記「現代化」吧！工業、科學和技術可以大大發展，但不必用「現代化」來掩飾。(否則我們用什麼來批判現今中國的「現代化」呢？)「現代化」理論必然把很多歷史性的東西看待為不可避免的、自然的東西，這正是兩個貝加和卡拿的謬誤。

現代化論把現存社會制度看待為不可避免的東西，自然亦把「割離」看待為「社會心理學」的問題。以兩個貝加和卡拿的觀點來看，「割離」就是「認同危機」和「意義的失落」。既然「現代社會」的制度是不可改變的，唯有在現存制度內創制一些「結構」和「意義」使人的「精神」有所歸屬。這種理論的保守性是明顯的。你說要全面改變他們的「現代社會」嗎，他們便說你要取消科技經濟發展。這種低能的脆辨該被徹底摒棄吧！其實「割離」應該是一個唯物的概念。他展示的是人們生活在特定的社會組織 (Social formation) 裏的客觀關係。馬克思用「割離」這個概念來分析資本與勞動的關係：雖然工人參加了社會生產，但生產資料和成品都是被資本所佔有 (Appropriate) 和控制。勞動者的參與是倚賴性的參與。官僚組織所帶來的「割離」，在「形式」上，亦是相同的，在西方的自由民主社會，國家機器實質上資本家，官僚和政客所佔有 (Appropriate)，根據他們的階級利益來辦事。「擁有主權的國民」只是每隔幾年例行公事地選舉他們的統治者吧！

簡而言之，「割離」是統治階級的「佔有」和被統治階級的「倚賴性參與」(Touraine 說的 dependent participation) 的結果。這是客觀的社會關係和權力問題。現在再不是空談什麼「失落」和「人的本質的實現」的時候了。人文主義精神或許對人類提供了鼓勵，但人文主義還是人文主義——Althusser 所說的「意識型態」(Ideology)。反割離應該對統治階級佔有的社會的「重新佔有」和真正的自主的社會參與。